

戈巴契夫繼承的遺產和面臨的困難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戈巴契夫 (M.S. Gorbachev) 政權並未蓋棺，自然無法論定。對於戈巴契夫本人，現在也只能談還無法論。

一個政治人物，常常是歷史造成的。他受歷史影響，也對歷史負責，他能否掃除過去歷史的陰霾，開創未來光明的歷史，會受到許多複雜因素的影響。有的會成功，有的會挫敗。

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西德有一本暢銷書：新的革命的前夕。蘇聯共產主義的未來 (Am vorabend einer neuen Revolution? Die Zukunft des Sowjetkommunismus)。作者沃伏剛·李昂哈特 (Wolfgang Leonhard) 在大戰時曾流亡到蘇聯，戰後做過東德共黨領袖烏布利希 (Walter Ulbricht) 的秘書，因而掌握了有關共產黨的詳細資料。

這本書首先介紹了俄國革命後各方人士對蘇聯的意見。接着分析了蘇聯民衆、權力人物、反體制知識份子各種流派關於將來的預測並加以評論。從而作者認識到缺乏民主的傳統，政治的不成熟，是最近的將來蘇聯民主化、自由化的最大障礙。

李昂哈特指出，社會已經工業化，但黨和意識形態却故態依然，黨不能配合社會發展的步調，於是大幅度變革，就有其必然性。然而就現狀言，黨內還看不見代表變革的勢力，當前民族主義的傾向將要強化，宗教也要復權。不知什麼時候會有大的變革。但這種變革可能起自黨內，而且是非暴力的。^①

戈巴契夫稱其改革為重建 (PERESTROIKA)，是第二次革命。他的變革是起自共產黨內，其初衷也確是非暴力的。可是，他會成功嗎？他能始終貫徹非暴力嗎？我們且來談談。

註① 轉自朝日新聞夕刊 (日本)，一九七五年九月廿二日，第三面。

戈巴契夫於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生於俄羅斯斯塔夫羅波爾(Stavropol)邊區、克拉斯諾格瓦迭伊斯科的農家。第二次大戰爆發時他才過九歲，他應該沒有受過俄式革命和戰爭的洗禮，稱得上是戰後的一代。十五歲至十九歲時，曾任聯合收割機司機的助手。後來進入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攻讀法律，一九五五年他廿四歲時畢業，獲法學士學位。由於他在大學時，曾擔任大學青年團(komsomol)書記職務，回到斯塔夫羅波爾邊區後繼續做團務工作，繼又做黨務工作。也做過該邊區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地區生產管理局黨的組長，並於一九六七年通過考試、卒業於斯塔夫羅波爾農業學院函授部，有農業專家之稱，也是他日後進入中央管理農業的條件之一。他在斯塔夫羅波爾邊區做過黨委會第二書記(一九六八~七〇)、第一書記(一九七一~七八)，於一九七〇年獲選第八次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一九七一年當選中央委員。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任蘇共中央書記，遞補也曾擔任過斯塔夫羅波爾邊區黨委會第一書記的庫拉科夫(Fedor D. Kulakov 病故)的遺缺，主管農業，上任後曾在斯塔夫羅波爾邊區開始農業改革的實驗，結果良好。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七日，戈巴契夫被提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八〇年十月廿二日他剛滿五十歲時升為政治局正式委員。其時，中央書記處已經老化，除戈巴契夫外，其他書記都已是七十幾歲的高齡，而蘇斯洛夫(Mikhail A. Suslov)則年近八十(一九八二年一月廿五日死亡時七十九歲)。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統治蘇聯達十八年之久的布里茲涅夫(Leonid I. Brezhnev)死亡，十一日蘇共召開非常中央全會，六十八歲的安德洛波夫(Yury V. Andropov)當選總書記。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安德洛波夫死亡，十三日召開非常中央全會，七十二歲的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當選總書記。原本被若干人看好的戈巴契夫未當選，但他在契爾年科任內擔任過去蘇斯洛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科都曾擔任過的主管思想理論的中央書記，且已儼然是第二書記的架勢。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契爾年科死亡，當天召集非常中央全會，戈巴契夫當選總書記。當選之後，他立即宣布取消當晚例行的慶祝宴會，要求委員們各返崗位努力工作。

從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五年三月，蘇共連續死了三個總書記，黨和國家的領導者頻繁更迭並不是一件好事，這或許會使得年輕的領導人上台成為順理成章。然而，戈巴契夫具有機智及幽默感，冷靜而充滿自信，在所主持的工作方面多有建樹。他的爬升是由於本人的努力，而非依靠旁人提拔。

戈巴契夫穩定政權的速度也是驚人的。過去，黑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當權後，需時四年始肅清異己勢力。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六四年上台，最初是三頭馬車，經過相當時日，到一九七七年六月包戈尼(Nikolay V. Podgorniy)辭去最高蘇維埃主席後，才使權力定於一尊。戈巴契夫上台後四個月，原本是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省黨委會第一書記、蘇聯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可與戈巴契夫抗衡的羅曼諾夫 (G. V. Romanov) 於一九八五年七月下台。另一位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黨委會第一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格里辛 (V. V. Grishin) 也於同年十二月廿四日被解除莫斯科市黨委會第一書記職務，由葉爾欽 (B. N. El'tsin) 取代。至於元老級的葛羅米柯 (A. A. Gromyko)，則被架上國家元首的空位。而戈巴契夫的權力，迅速就獲得穩固。

一

戈巴契夫於布里茲涅夫時代即進入蘇共中央，且爬升到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的地位。年輕有為，很早他就是改革派。不過，布里茲涅夫性格保守，一九八一年黨大會時，十四名政治局委員，一個都不曾更動，而其平均年齡高達六十九歲。人事上是一塘死水，政策也呈現停滯。安德洛波夫和契爾年科為時短暫，因而人事大刷新的任務，就落到戈巴契夫的頭上。

政治局委員中另一位元老，從一九八〇年起就擔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的吉洪諾夫 (N. A. Tikhonov, 八〇歲) 於一九八五年十月退休，由雷日科夫 (N. I. Ryzhkov, 一九八五年四月始任政治局委員，五六歲) 繼任。哈薩克出身的政治局委員、哈薩克共和國黨委會第一書記庫納耶夫 (D. A. Kunayev)，原被目為布里茲涅夫的繼任者之一，於他七十四歲時，即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因阿拉木圖暴動，被解除了第一書記職務（由西伯利亞出身的俄羅斯人科爾賓 (G. Kolbin) 繼任）。他的政治局委員一職，維持到一九八七年一月，算來他至少幹了十五年的政治局委員。三月十四日，他被哈薩克共黨驅逐出黨。

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五日至三月六日蘇共第廿七次代表大會後，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除戈巴契夫本人外，布里茲涅夫任命的委員共有三人，即：葛羅米柯，他的外長職務由謝瓦納澤 (E. A. Shevardnadze) 繼任；庫納耶夫，業見前述；謝爾比茨基 (V. V. Shcherbitsky)，他是烏克蘭共和國黨委會第一書記，一九八七年三月廿四日開始的烏克蘭共黨中央全會中，謝就受到抨擊，顯示了他的前途並不光明。第廿七屆蘇共中央領導班子中，一九八六年當時超過七十歲的有政治局委員葛羅米柯 (七六歲)、庫納耶夫 (七四歲)、索洛敏澤夫 (M. S. Solomentsev 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七二歲)；政治局候補委員中有索科洛夫 (S. L. Sokolov 國防部長，七四歲)；中央書記處書記季緬揚寧 (M. V. Zimyanin 主管文化、教育，七十一歲)。其餘都是五十幾歲、六十幾歲。

在政府人事方面，戈巴契夫上台後，除部長會議主席更迭外，並於一九八五年三月廿二日將七十五歲的動力和電氣化工業部長聶波羅日尼 (P. S. Neporozhny) 免職，由五十六歲的馬幽瑞茨 (A. I. Maiorets) 繼任。繼之，運輸建設部、黑色金屬冶金部、外交部、輕工業部、建築工業部、建築材料工業部、高等和中等專科教育部、建築道路及公共設施機器製造部

、外貿部、石化工業部等首長均予更迭。而七十四歲的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巴依巴科夫(N. K. Baibakov)也遭免職，由五十六歲的塔里津(N. V. Talyzin)繼任。

據統計，截至一九八七年初，黨中央部長級幹部二一人，更迭了百分之七十。地方、州第一書記一五七人，更迭了百分之四十五。政府部長級一〇五人，更迭了百分之七十。駐外大使一三七人，更迭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在蘇共中央，戈巴契夫上台後的新面孔，計(總書記除外)政治局委員十人中有五人，候補委員八人中有六人，書記十一人中有八人。^②另據蘇聯人民監察委員會主席什科爾尼科夫(A. M. Shkol'nikov)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報告稱，在過去一年間，蘇聯經濟官僚約一萬三千人因濫用職權被撤換。同一期間有十萬個經營者被發覺有偽造文書及冒領公款等公然違法犯紀的行為。^③

這些都是戈巴契夫上任後初期的人事變更，以後自然會賡續進行。我們不能把這完全視為整肅異己的權力鬥爭。戈巴契夫起用的新人，大致都符合年輕化、技術化、效率化的標準。另一方面，這樣大更動，也是整飭綱紀、懲治貪瀆、重振勞動紀律，以健全黨政組織，提高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與地位，藉以提高行政效率與經濟效益。而其大刀闊斧的作風，則可展現其膽識、果斷與毅力。

三

戈巴契夫主管農業和輕工業時，一直在進行改革。提到蘇聯的經濟改革歷史，則是由來已久。蘇聯的經濟模式是史達林建立的，但在他的晚年，已有改革之議。

黑魯曉夫於一九五四年籌畫農業改革，開始開墾哈薩克的處女地。其時，布里茲涅夫被派往哈薩克共和國擔任黨委會第二書記，不久就成爲第一書記。在蘇聯從事改革，不能不觸及那個僵化的史達林經濟模式，也就不能不反對史達林。黑魯曉夫於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第廿次代表大會秘密發動反史，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他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兩院聯席會議提出「關於進一步改進工業和建築組織工作報告」，建議將當時工業與建築組織的管理形式，由中央集權制改爲民主集中制，將全國各加盟共和國劃分爲若干個經濟行政區，各區設立國民經濟委員會，負責管理工業與建設工作。當時蘇聯全國有工業企業二十餘萬個，建築工地十餘萬個，實行中央集權的管理，是頗有不便的。五月十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根據黑魯曉夫的報告，通過「關於進一步改進工業和建築管理組織」的決議，在全國劃分了一〇五個經濟行政區，各成立國民經濟委員會(十二月一日

註② 「戈巴契夫的改革」(下)，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一日，第七面。

註③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日，第七面。

日，俄羅斯撤銷兩個國民經濟委員會後，尚餘一〇三個。黑魯曉夫也進行黨的改革，一九六一年十月第廿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新綱領」，規定實行集體領導，黨領導機構每屆選舉至少更換三分之一，連任以三次為限，否則須得票四分之三始得連任（蘇維埃亦然）。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有關「發展蘇聯經濟與黨的領導問題的決議」，在黨內分別設立領導工業與農業的兩個系統，省和邊區設立兩個獨立的黨委員會，形成兩個對立的黨部，其效果必然不佳。黑魯曉夫終於一九六四年十月下台。

繼黑魯曉夫之後的三頭馬車，即第一書記布里茲涅夫，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A. N. Kosygin）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A. I. Mikoyan 米退休後為包戈尼）的集體領導。最初布里茲涅夫對內只主管農業，收拾黑魯曉夫農政的殘局，苦心積慮地治療其後遺症。對外則似乎只管共產集團之黨和黨的外交。柯錫金則對內主管工業，對外則處理對西方與對第三世界的外交。一九六四到一九六九、七〇年左右的五年，是對黑魯曉夫政策的調整期。此後，特別是一九七一年第廿四次代表大會以後，布里茲涅夫就從柯錫金手裏收回主導權，推行自己的路線。後來柯錫金因病辭職（一九八〇年死），一九七七年六月包戈尼讓出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地位，由布里茲涅夫自兼，就進入了真正的布里茲涅夫時代。

布里茲涅夫性格保守，他雖受黑魯曉夫提拔，但不贊成黑氏那樣喜歡改革。如果說黑魯曉夫是非史達林化，則布里茲涅夫是非黑魯曉夫化，也有人說是新史達林主義。黑魯曉夫時代對內政策比較鬆動，布里茲涅夫則再度收緊。黑魯曉夫對外倡言和平共存，布里茲涅夫執行的緩和外交，雖也是和平共存的一種方式，但他是以實力地位與西方週旋，並在第三世界實行滲透與擴張。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頭馬車指導下的首次中央全會，由包戈尼（其時為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兼中央書記）提議將分立的工業、農業地方、州黨委員會及蘇維埃加以統合。一九六六年春布里茲涅夫主持的第廿三次代表大會，對黨的體制作了大幅度的修正。其一是恢復政治局。政治局本是十月革命前夕即一九一七年十月廿三日，為了武裝起義，由列寧、史達林、托洛茨基等七位幹部組成，革命後一九一九年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決定明文記載於黨章內。在史達林時代，特別是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兼任部長會議主席後，這個政治局就成為典型的發揮獨裁功能的機構。一九五二年十月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由黑魯曉夫（當時為中央書記）提議，改稱主席團。一九六六年春的第廿三次代表大會，身任第一書記的布里茲涅夫親自提議，將主席團仍改稱政治局。其二是恢復總書記制。一九二二年以降，史達林任總書記。其時書記處下，分設主管政治、經濟、軍事、對外關係、思想理論、文化各領域的二十多個專門部會，大權操諸總書記之手。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間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企圖廢總書記制以抑制史達林的權力。同年十二月，曾任列寧秘書的基洛夫（Sergey M. Kirov）在史達林陰謀下被暗殺。史即以此為藉口大捕反對派，演變成以一九三六至三八年為高潮的三十年代大整肅。此後史達林獨裁更甚於往昔。

一九五二年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史達林辭總書記，由馬林科夫（George M. Malenkov）任第一書記。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死亡，同年九月黑魯曉夫當選第一書記。第一書記和主席團的名稱，至少在表面上是一種集體領導的形式。不過，第廿三次代表大會中，由當時的莫斯科市黨委會第一書記葉哥里契夫（Nikolay G. Ekorichev）提議，恢復總書記名稱。其三是廢止幹部任期制，第廿三次代表大會中，布里茲涅夫提出報告，指稱幹部頻繁更迭，會「縮小熟練的、有經驗的黨活動家的選任範圍」，因而廢止了黑魯曉夫時期的幹部任期制。

布里茲涅夫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質上更趨保守與集權。例如嚴格入黨條件，藉更換黨證進行整黨，壓制反體制運動，興文字獄，放逐索忍尼辛（Aleksandr I. Solzhenitsyn）等。^④其晚年的政治局，年老而專斷，依蘇聯將軍察戈羅夫的說法，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入侵阿富汗，是由布里茲涅夫、葛羅米柯、前國防部長烏斯蒂諾夫（Dmitriy F. Ustinov）和國家安全委員會（KGB）主席安德洛波夫四人所決策。^⑤

在經濟方面，一九五〇年代的蘇聯經濟成長率每年百分之一〇以上，一九六〇年代即逐年下降。一九六五年九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柯錫金提出的關於「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計畫工作和加強生產的經濟刺激」的報告，經一九六六年一月開始實施。這是一種引進利潤方式，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核心的改革。例如減少上級計畫指標；企業考核由總生產量改為以利潤率為基準，利潤之一部允許企業留作改善設備與福利設施；增加勞動者的獎金等等。這一改革的嘗試，既無充分準備，又不涉及制度本身，初期尚能提高工業生產，至一九六〇年代末停止。一九七〇年代經濟計畫即無法達成，經濟上依靠石油漲價及酒的消費來維持。體力勞動比重過高，市民生活受理論上不應存在的通貨膨脹的壓迫。經濟成長逐漸下降，至一九七五年開始停滯，一九八〇年前後，實際上是負成長，這些都是戈巴契夫後來說明的。^⑥

一九七〇年春，西方即推測柯錫金行將失勢。後來他果然因病辭職，至一九八〇年死亡。布里茲涅夫仍然有些改革，但其幅度不大。而且有逐漸中央集權化跡象。本來，一九六五年九月蘇共中央全會時，就決定廢止黑魯曉夫時期的國民經濟委員會，恢復工業指導部。同年十月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時，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馬祖洛夫（Kirill T. Mazurov）提出關於「改善工業管理」的報告，於是聯盟中央就恢復了十七個工業關係部，此後更逐漸加多。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發表黨和政府「關於進一步改善工業管理的若干措施」，對各企業進行大規模的統合，其統合體由部直接指導，排除中間管理機構，使經

註④ 以上資料主要參考：（一）木村明生，布里茲涅夫時代論，日本東京，一九七八年版；（二）下斗米仲夫，戈巴契夫時代，日本，岩波書店，一九八八年六月廿五日第一版第二刷。

註⑤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第四版。
註⑥ 下斗米仲夫，前引書，一八、一九頁。

濟管理簡單化、效率化。過去，工業關係部下，還有部門別總局或地區管轄部局，部透過這些中間機構管理聯合企業和企業。在新的決定下，依產業部門別創設全聯盟規模或全共和國規模的產業聯合體，廢除總局等，成立部—產業聯合體—聯合企業、企業三級，或者是部—聯合企業、企業二級（省掉企業聯合體）的管理制度。這和一九六五年九月全會提出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經改方向是相反的，它朝向中央集權前進。

四

安德洛波夫就任總書記後，首先做的兩件事就是整頓紀律和振興農業。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號召加強勞動紀律，過去視為常事的無端欠勤（曠職）、午飯以外的時間外出、長時間的電話、吸煙、飲酒、將產品私自携出等等，均加以嚴格取締。一九八三年四月，蘇聯科學院、蘇共中央委員會、國家計畫委員會三個單位秘密召開研討會，蘇聯經濟領導階層的經濟官僚、企業幹部也出席參加。研討會作成經濟秘密報告書，指出蘇聯經濟管理方式的特徵是：（一）經濟政策的策定採高度中央集權制；（二）輕視市場機制；（三）企業的原材料供應由中央管理；（四）勞動者的物質刺激政策由中央決定；（五）部門別管理較地區性管理佔先。報告書認為這只適合三十年代蘇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準，現今已落在時代之後。報告書強調改革，並指摘阻礙改革的是特權階級。^⑦

一九八三年六月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時，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里耶夫（G. A. Aliev）提出「勞動集體法」草案報告，通過「關於提高勞動集體及其在企業、機構、組織管理的作用的法律」，於同年八月一日公布實施。該勞動集體法是以經濟重建為目標，賦予工廠、農場、勞動集體單位中的基層作業班、組一定的裁量權和經營參加權，以提振勞動意願。並於一九八四年起在一部分工業部門擴大企業自主權，進行經濟改革的實驗。這被蘇共鼓吹為蘇聯的「自我管理」。

在農業方面，布里茲涅夫時代就在部分地區實施集體承包制。其方式是由農民自願組成班（四、五個人的單位）、組（數十人），與集體農莊或國營農場簽訂契約，在承租的土地上，自主地從事農業生產，班與組對其構成員付予頭金，此後再依收成支付薪資及獎金。一九八三年三月在俄羅斯共和國的別爾哥羅德舉行全蘇農業會議，由當時蘇聯農政最高負責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戈巴契夫大力提倡，承包制始大幅度普及。依當時農業部長梅夏茨（V. K. Meshyats）同年中期的說法，蘇聯當時已有十五萬以上的集體承包組，承包耕地面積四百萬公頃，生產力提高百分之十至三十。^⑧農業改革的基

本精神，仍然是由集權走向分權，擴大生產的自主性。

註⑦ 參閱：（一）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三年八月四日，第五面；（二）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六日，第四面。

註⑧ 參閱：（一）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八日，第四面；（二）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八月七日，第五面。

安德洛波夫政權為時短暫，任內曾在波羅的海三國及格魯吉亞從事改善經濟結構的實驗。一九八四年起開始大規模經濟實驗，但他於同年二月病故。繼任者契爾年科是個保守派，但第二書記戈巴契夫却極力主張改革。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的莫斯科意識形態大會中，戈巴契夫在演說中就抨擊保守的經濟學家，大力提倡改革。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就任蘇共總書記時，蘇聯的現狀是經濟停滯，科技落後美國十至廿年。而黨、政、社會都呈現僵化現象。這就是他所承繼的歷史遺產。戈巴契夫上台後不久，即於一九八五年四月蘇共中央全會中提出「加速社會與經濟發展」戰略方針（簡稱「加速戰略」），於一九八六年三月第廿七次代表大會中正式予以確定。他要打破僵化的經濟體制，並發展科技以促進經濟發展。這在蘇聯正是對症下藥。

戈巴契夫對於蘇聯社會的病源是知之頗稔的，他在一九八八年六月廿八日開始的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中，對蘇聯模式的特徵作過如下的描述：

(一)「作為蘇共建設和活動基礎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被官僚主義的中央集權制所取代」，「基礎黨組織和普通黨員喪失了對黨的活動內容施加影響的可能性」；

(二)「居民的基本群眾被排除在實際參加解決國家和社會事務之外」；

(三)「社會生活過分國家化」，「國家調節擴大到了社會生活的極廣泛範圍」，「力圖用詳細的集中計畫和監督來含括生活的所有角落，這種作法已經籠罩整個社會，成為人們、社會組織和集體積極性發展的嚴重障礙」。^⑨

基於此種體認，戈巴契夫提出了「通過革命性改革，塑造社會主義新面貌」的任務。他認為真正完善的社會主義應該具有七項特徵，這就是真正的、現實的人道主義；有效而活躍的經濟制度；社會公正；高度文明和道德；真正的人民政權；各民族真正平等；追求和平。^⑩為了建立「民主和人道的社會主義」，戈巴契夫就以重建(Perestroika)的精神，從事全面性的改革。政治上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社會上的公開性(Glasnost)，與經濟改革同時進行。所謂「新思維」(New Thinking)不僅施之於內政，也用之於外交，以洗刷掉過去的不良色彩。

五

註⑨ 轉自「蘇聯模式的基本特徵——戈氏的變形論和矯形術」(中)，文匯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第二版。

註⑩ 引自范琦勇，「戈爾巴喬夫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D「外國政治、國際關係」(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複印報刊資料)，一九九〇年一月，九七～九八頁。原註：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第九七～九八頁。

戈巴契夫首先要壓低共產黨的任務。蘇共中央原設有若干部，依其名稱指導、監督政府內各相關部會。一九八八年九月三十日的蘇共中央全會，決定廢除黨中央的重工業與電力機械部、輕工業與消費品部、農業與食品工業部等十個以上的部。另設黨建設與幹部政策委員會、意識形態委員會、社會經濟政策委員會、農業政策問題委員會、國際政策問題委員會、法制政策問題委員會。此項改組，用意即在使黨僅作內外政策基本戰略和思想教育的指導，不再直接介入立法與行政，以縮小黨的權力，實現黨政分離的構想。

一九八九年下半，東歐鉅變，各國共黨紛紛更改黨名，並修改憲法，放棄共黨一黨專政的法定地位。但直到同年十二月，戈巴契夫仍堅持一黨專政。一九九〇年一月，他在立陶宛時，才鬆動了口氣。二月七日的蘇共中央全會中，他親口提議修改黨綱，放棄一黨專政。三月十三日人民代表大會以壓倒性多數修改憲法第六條，廢除了共黨專政的地位。

戈巴契夫原擬廢除黨的總書記一職，改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廢除政治局，改設政治執行委員會；並將中央委員減為二百人，藉以縮小黨的組織。然而同年七月的第廿八次大會，為防止分裂，戈巴契夫不得不放棄此一腹案，仍然維持了原有的組織。他把政治局委員擴充為廿四人，使各加盟共和國黨委會第一書記都成為政治局委員。惟人多開會不易，實際上降低了政治局的角色地位。戈巴契夫仍當選總書記，經他提議增設副總書記一人，由原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伊瓦斯科（V. A. Ivashko）當選。顯然，這是把黨的權力逐漸轉移到政府的一項設計。

在縮小黨權的同時，就要提高作為蘇聯最高權力機關的最高蘇維埃的權力。政治體制的改革，也是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決定的。一九八九年三月選舉，新成立二、二五〇名代表組成的人民代表大會，由代表大會再選出五四二名代表的最高蘇維埃（聯盟院、民族院各二七一）為常設機構。最高蘇維埃每年春秋兩個會期，每一會期由過去的一至二日改為三至四月，以便發揮議事功能。而戈巴契夫則出任握有實權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國家元首）。本來，早在一九八七年左右，蘇聯文學報和「社會主義體制世界經濟研究所」中，就有人提議蘇聯應實行總統制，當時戈巴契夫以不符合蘇聯傳統加以拒絕。嗣因東歐鉅變及蘇聯境內民族主義抬頭、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傾向高漲，使戈巴契夫又改變了主意。一九九〇年二月七日蘇共中央全會修改黨綱放棄共黨一黨專政的同時，也決定為確保國家穩定發展、加速重建，並確保各政府機關在實施民主化的過程中能維持正常運作，應實施民選總統制並賦予強大之行政權力。且強調有確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制度及強化法院獨立性、保障社會法治之必要。這些主張又是出自戈巴契夫本人。

經濟改革方面原有從一九八五年起分階段實施的計畫，一九九一年以降要全面推行新經濟體制並進一步予以完善。此外也通過不少相關法令，然而由於反對者的阻撓、幹部的官僚主義，致使企業改革無法開始進行，文匯報記者於一九八九年訪問蘇聯時即發現此一問題。①此外，蘇聯經改主要的失誤在：（一）「加速戰略」忽視經濟結構改革，頭兩年耗費大量人力和

物力，生產不少「無人需要的東西」，造成極大浪費，並埋下日後財政危機的種子。「企業法」滋長「集團利己主義」，企業停產利潤小但對人民生活却必不可少的產品，轉而生產利潤高的商品，致使日用品嚴重缺乏。(二)蘇聯政府每年用於對食品、某些工業消費品、農產品、住房、交通運輸等的財政補貼高達一、一〇〇億盧布，約佔國家預算四分之一。政府錯過物價改革，而一九八九年居民收入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二·九，工業產值僅增百分之二。一九九〇年頭九個月，在生產出現負成長的情況下，居民收入又比上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四·四。政府既無因應良策，必使市場失控、物價飛騰，國民經濟解體。(三)財政惡化未引起足夠重視，忽視健全財政的措施。^⑫

一九八七年一月蘇共中央全會中，戈巴契夫宣稱：「只有通過民主和借助民主，改革才有可能實現」。一九八八年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以來，採取了一系列激進的政治改革措施。可是，在民主化、多元化的口號下，政治改革不但沒有發揮促進經濟改革的作用，反而使得地方民族主義、分離傾向抬頭，各共和國和地區紛紛發表「主權宣言」，將自己的法律效力置於聯盟法律之上，致使各級政權癱瘓，社會秩序紊亂，舊經濟體系崩潰，新經濟秩序未建立，生產和勞動紀律廢弛。這些都嚴重妨害了經濟發展，使一九九〇年蘇聯國民所得負成長百分之四、國民總生產(GNP)負成長百分之二，勞動生產率負成長百分之三，成為第二次大戰後之最低。而這些更促成人民對改革失去信心，以及地方的分離傾向。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七至廿七日，蘇聯召開了第四次人民代表大會。戈巴契夫在會中報告時稱：「我們真正在經歷着危機的時刻」。「現在最需要的是在國內恢復秩序」，這就需要「堅強的政權、紀律和對落實決議的監督」。這次大會通過一項決定，認為必須就革新聯盟、在穩定經濟和保障居民社會福利的基礎上過渡到市場經濟、形成有效的政權執行機構體系等方面採取綜合措施。決定提出了十三項措施，包括加速起草並簽訂聯盟條約和一九九一年臨時經濟協議、穩定貨幣信貸和財政體系、改變國家執行機關的結構以及立即解決民族衝突等重要內容。大會於十二月廿四日就是否保存聯盟和更改國名問題進行表決，結果多數代表贊成聯盟繼續存在和保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國名。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戈巴契夫提出加強國家政權結構的設想。第四次人民代表大會於十二月廿一日，由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A. Lukiyarov)作修改憲法的報告。大會對憲法作了三十七項修改，其主要內容為：撤銷總統委員會，將聯邦委員會由協商機構轉為決策機構，由總統領導整個國家管理體系，設立副總統職位，將蘇聯部

註⑪ 孟東明，「蘇企業改革尚未起步」，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第三版。

註⑫ 參閱沈潔良，「蘇聯經改的主要失誤」，文匯報（香港），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第二、四、四版。

長會議改為直屬總統領導的內閣，成立安全委員會（會議）來落實聯盟的國家防務政策等。這樣，蘇聯就成為完全的總統制國家。大會中由總統提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國際事務的中央書記亞納耶夫（G. I. Yanayev）當選副總統。

在上述人民代表大會中，首有車臣——英古什自治共和國機器製造廠女生產隊長烏馬拉托娃對戈巴契夫提出不信任案；次有外長謝瓦納澤（E. A. Shevardnadze）突然宣布辭職，表示他個人「對專政發出的抗議」；復次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因病住院，而財政部長議程外發言稱各加盟國領導人會議未能就分配收入問題同中央達成協議後，戈巴契夫指出俄羅斯聯邦一九九一年只打算向國家提供二三四億盧布，比一九九〇年少一、一九〇億盧布，這將嚴重影響國家向國民經濟、國防、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領域的撥款。^⑬

戈巴契夫面對的形勢是嚴峻的，不過歷次艱險他都順利過關，而且不斷提升他的權力。他會走向專政嗎？他回答謝瓦納澤指摘時說：「不能把強有力的政權同專政混為一談」。

戈巴契夫不是一個絕對固執己見的人，必要時他也會讓步以求妥協。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三日最高蘇維埃通過由中央計畫經濟轉型至市場經濟的計畫大綱。其後戈巴契夫不採納葉爾欽和沙塔林（S. S. Shatalin）的五百天內轉向市場經濟的計畫，也不採納雷日科夫過於謹慎的計畫，而自提在兩年內分四階段邁向市場經濟的計畫，也未可厚非，因為過激或過緩都不見得是好事，當然這不是說戈巴契夫就絕對正確。

戈巴契夫上台後的種種作為，和其前幾任大不相同。他任內大肆批判史達林，平反了包括布林（Nikolai I. Bukharin）在內的被史達林整肅的受害者，改寫了蘇聯歷史，並提倡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但什麼是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呢？西德前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曾就此請問過戈巴契夫，戈氏先望了一下謝瓦納澤，再望望蘇共中央國際政策問題委員會主席雅科伏列夫（A. N. Yakovlev），見二人都沒有答案，他才自己回答說：「我想就像瑞典那樣」。但施密特認為，瑞典是成熟的資本主義和成熟的福利國家，跟馬克思主義無關，是與蘇聯不同的。^⑭由此可見，戈巴契夫的改革，事先並無一個長期的完整而清晰的計畫，甚至不曾有一個清晰的目標藍圖，因此他於第四次人民代表大會開幕致詞時，不得不承認過去五年的重建工作犯了某些過失。至於他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真理報刊登的訪談中，聲言絕不容許蘇聯解體，那應該屬於總統的本分。

註⑬ 蘇聯第四次人民代表大會資料，係參考唐修哲，「穩定局勢、擺脫危機——蘇聯第四次人民代表大會側記」，瞭望週刊海外版（北平），一九九一年一月七日，三四頁。

註⑭ 施密特，「戈巴契夫的蘇聯以瑞典為指標」，轉自經濟學人（日本），一九九〇年一月九日號，一〇五頁。

爲了防止蘇聯解體，一九九〇年四月三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解決與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有關問題的程序法」，那個難於上青天的退盟程序，很難爲各共和國所接受。戈巴契夫擬提高各加盟共和國的自主權，以主權國家聯盟方式另組新聯盟。新聯盟條約草案於同年十一月下旬公布，各共和國又紛紛聲言不參加簽署條約，最後只好由全民公決。

蘇聯在民族衝突中曾動用軍隊維持秩序，並曾出兵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因此受到國內外抨擊，也是理所當然。不過，把立陶宛和天安門相提並論是不恰當的。天安門廣場上只有徒手訴求民主的學生和民衆，立陶宛等事件性質就略有不同。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一日，立陶宛通過法令，宣佈在立陶宛領土上蘇聯憲法不再有效。不少共和國起而仿效，紛紛發表「主權宣言」，把自己的法律，置於聯盟法律之上。這是中央政府所難以容忍的。立陶宛似乎想從法律上、政治上脫離蘇聯，在經濟上留在聯盟之內。而且把講俄語和操波蘭語的居民降爲二等國民。同樣向蘇聯爭取獨立的格魯吉亞加盟共和國，却廢止境內爭取自主的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的自治地位。

過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下，是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自治區，權力自上而下分配，加盟共和國發表主權宣言後，上行自有下效，自治共和國等也可發表同樣宣言。蘇聯三十八個民族區劃中有三十一個位於俄羅斯聯邦，這個擁有一百多個民族的聯邦下面十六個自治共和國當中的大多數，都通過宣言，自認是主權國家，而刪去原來名稱中的自治字樣，如果蘇聯階梯式的民族區劃，其權力由自上而下的分配，改爲自下而上的授權，弄不好會導致俄羅斯聯邦乃至蘇聯解體的危機。^⑮最近蘇聯的強硬派，由反對轉而支持戈巴契夫，當與防止蘇聯解體有關。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改組後的蘇聯聯盟會議，通過加盟共和國採行一致的經濟制度。至於政治制度，則新聯盟條約公民投票的結果及各共和國參加的情形尚未可知。

戈巴契夫如何渡過經濟、社會、生態和行政與民族區劃制度的危機？截至本文執筆時止，戈巴契夫並未行使總統權力直接統治波羅的海三國，且指示克宮官員與三國會談。他是否會走史達林的老路呢？他的重建能够完成還是終歸失敗呢？現在都還言之過早。但正如篇首所引名著所說，當前在蘇聯，民族主義傾向確已強化，宗教也已復權，民主傳統的缺乏、政治的不成熟，確是民主化、自由化的最大障礙。筆者只願加上一條，物資短缺，諸多條件不具備，貿然實行市場經濟，也是危險的。

註⑮ 參閱莫斯科電台廣播（一九九一年一月廿七日）。